

K 快言快语

对变相贿赂更须加大打击力度

海之波

国务院日前召开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指出，今年要坚决查处领导干部以各种名义收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的行为。当前社会上收送礼金的名目繁多，特别是收送各类商业预付卡即购物卡的风气愈演愈烈。一些单位集中购买商业预付卡，开假发票报销，用这些卡来送礼行贿。对此类腐败现象，必须坚决治理。（4月6日《京华时报》）

用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等形式进行变相贿赂之风愈演愈烈，跟购物卡办理、使用简便，发送隐蔽、风险较小、处理简便、洗赃方便以及送卡人风险小、容易规避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执纪执法机关打击不力。一些执纪执法人员对这种新形势下的变相贿赂重视不够，了解不多，并且发现、打击、查处难度比较大，有意无意地放纵了这种变相贿赂，致使许多行贿人员与腐败分子利用收送购物卡的形式来收受贿赂，逃避打击。

在今天反腐倡廉处于高压态势的新形势下，许多腐败分子为了继续得到腐败的好处又逃避打击，绞尽心思想出了各种变相贿赂形式，各种贿赂手段让人闻所未闻。有的官员搞“腐败期权”，在位时为人办事，退休后再到行贿人所在公司挂虚名收受“顾问费”；有的官员利用赠博形式受贿，如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平时酷爱玩一种名叫扎金花的游戏，而且逢赌必赢，仅从一个人身上就先赢后输了80多万元；还有有的官员利用借高利贷形式受贿，如江苏省海门市原副市长张永斌借给开发商，利率高达40%。最近，我们从广东省原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受审又看到一种新贿赂形式，李通过任命肇庆中公用科技母公司公用集团的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拿内幕消息来回报李启红，让其赚得盆满钵满。

无论是利用购物卡还是利用赠博、借高利贷等各种形式进行贿赂，万变不离其宗，那都是利用权力进行权钱、权物交易，都是滥用了公权力，并且损害了国家的廉政制度，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本质上仍然是贿赂犯罪，必须得到查处。对于这些变相的贿赂犯罪，一方面，我们立法机关、最高司法机关要加强调查研究，适时出台相应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为司法机关办案提供有力的依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纪律检查机关、司法机关和执纪、执法人员要练就“火眼金睛”，透过现象看本质，充分认识到这些变相贿赂的危害性，加大查处打击力度，并且，应当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从源头上有效防止各种变相贿赂犯罪的发生。

7 头条评论

“董钱钱”哲学大行其道是民族之耻

舒圣祥

真该恭喜董教授，因为他已经一语成名了。依其自设成功标准，实乃名利双收。不过，网友们都很想问一个问题：财富意识十足的董教授，这个时候是否已经身价4000万了呢？如果没有，他是否觉得耻辱和失败？如果有，那么他的财富又从何而来？是否果真都能“合理合法”呢？作此猜测或许应该说是网民“仇富”心态的表现，但既然教授嫌贫在先，穷人们“狭隘”点也是情有可原。

在“董钱钱”成功哲学里，很多人的人生无疑都是“耻辱和失败”的，因为他们在40岁的时候还远远没有挣到4000万，其中就包括很多他的同行，特别是那些仍日立志于“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古董”们。以

“董钱钱”哲学大行其道是民族之耻

“董钱钱”的标准，他们真该挖个地缝钻进去才好，以免“有碍观瞻”。至于董教授的学生们，遇到这样一个嫌贫爱富的老师，心里大概五味杂陈；当然，董老师可以因为他们没钱而瞧不起他们，他们同样可以因为董老师太爱钱而瞧不起他。

“本是励志一句话，何必暴跳伤心肝。”董教授的本意，似乎只是想用量化的钱数来激励学生创造，如地产大佬任志强所认为的，董董的话是老师的“一种希望”。可是，如今的社会，已然是一个活脱脱的金钱崇拜社会，实在是不缺少“董钱钱”这样的“激励”。如果搞传销的喊出这种激励话语，公众必然不惊讶，他们向来就是以赚钱作为唯一目标；可是，现在说这话的是堂堂大学教授，他说话的对象也是高学历的研究生，进入微博传播之后更是面向了普罗大众。公众就要问：难道金钱真的是评价成功的唯一标准吗？

子曰：贫而无谄富而不骄，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可是新时代的“董钱钱”哲学，却公然叫嚣：贫穷不仅是失败，而且是耻辱；不仅是个人的耻辱，同样是老师的耻辱。倘若大学教授都如此爱钱，并且完全以钱高看或低看他人，大小贪官们贪点污受点贿，造假商们加三聚氰胺，房产商拿根毛竹当钢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在金钱决定一个人全部价值的“董钱钱”标准里，这些只要没有东窗事发，在个人心里大概都要算是“合理合法”的吧？因为为了赚

“董钱钱”哲学大行其道是民族之耻

钱大家都这么干的啊，董教授就是这样“谆谆教导”学生们，并视那些没发财的学生为耻辱的啊。

或多或少，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财富梦，这对于一个民族不是坏事；可是，一旦将金钱过度抬高，以至将之作为评价成功的最大标准甚至唯一标准，那绝对又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一个健康的社会，所需要的绝不仅仅只是商人和企业家；就像温家宝总理说的，“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倘若高学历者都掉在钱眼里，以“40岁时至少赚到4000万”作为目标，“董钱钱”哲学大行其道，那才真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和最大的耻辱。

区分两种为药家鑫“辩护”的言论

杨涛

“我要是他(药家鑫)，我也插……怎么没想着受害人(药家鑫事件中的死者)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很难想像，如此的话语竟然来自一个大学生药家鑫的同行师妹李颖。（4月4日《重庆晚报》）

药家鑫同行师妹李颖的观点，我绝对不接受。因为，这种观点已经践踏了法律与人伦底线，是在借用“宽容”为暴力杀戮开路。

围绕着药家鑫案，有两种言论，一种对药家鑫严加斥责，要求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种则认为他虽然罪行严重，但

区分两种为药家鑫“辩护”的言论

罪不至死，且有从轻情节，希望能保留他一条性命。其实，一个社会，存在多种意见分歧是正常的，真理只有在“意见的自由市场”博弈中才能胜出，并且这种经过意见市场洗礼胜出的真理才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并且能得到人们的信服。

辩护是公民最基本的法律权利，我始终相信，尊重坏人的权利，让坏人也能得到充分的辩护恰恰是一个国家尊重人权的晴雨表。所以，为药家鑫的正当辩护的言论不应当受到网络暴力攻击。但是，所谓的“辩护”，应当有法律底线与人伦底线。比如，主张对药家鑫可以考虑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认为他平时一贯表现比较好，有自首情

“虎妈”的成功不值得模仿

苑广阔

在蔡美儿的著作《虎妈的战争》中，被她骂成垃圾，也不准看电视或有玩伴的长女索菲亚(中文名蔡思慧)，同时被耶鲁和哈佛录取，即将成为长春藤盟校的学生。（4月5日《重庆晚报》）

随着记述自己“棍棒教育”的《虎妈战争》成为畅销书，华裔“虎妈”蔡美儿的教育理念遭受了美国公众的广泛质疑，“虎妈”也多少有些灰头土脸。但是现在“棍棒教育”结出硕果了，“虎妈”会不会因此感到扬眉吐气，她的教育理念会不会因此大行其道？

这正是笔者最为担心的问题。无论如何，“虎妈”的“棍棒教育”是违背科学、违背主流教育理念的。但问题是，中国的一些家长奉行的正是一种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功利教育观念，对“虎妈”的“棍棒教育”，一些父母会不会群起效仿？

实际上，“虎妈”把自己的一个女儿送进了世界著名大学，不能成为她的教育理念值得推崇的理由。道理其实很简单，首先，每年全世界考人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学生成千上万，难道个个都是“棍棒教育”的结果吗？其次，很多家长奉行的恰恰是和“虎妈”的教育观相反的宽松教育、诱导教育，但同样也把孩子送进了耶鲁和哈佛，这又如何解释？

每个人天分不同，成长和学习环境不同，家庭条件也千差万别，所以任何人在子女教育上的成功，别人都无法简单地复制，最多就是有所启发，有所借鉴而已。

救驴友怎么是浪费公共资源?

陈一舟

38名高校师生和1名公司职员，在房山周口店地区猫耳山登山踏青时，迷失方向，被困山中。警方调集消防、巡特警等多警种近300人，连夜展开搜救山营救。4日早上更是出动警用直升机，将最后两名被困山中一夜的“驴友”救下。（4月5日《京华时报》）

一起突发事件，所有遭困者成功获救，警方的救援可圈可点。但警方的救援非但没有得到掌声，反而引发“怨声”一片：有人指摘驴友草率登山“罪有应得”，

救驴友怎么是浪费公共资源?

有人抱怨警方出动直升机小题大做，还有人发出了“为救这些无知驴友耗费如此巨大公共资源到底值不值”的感叹。

必须要承认，这大大过业余的登山队伍，准备是不足的，行动是草率的，登山素质更是不高。“据被困学生透露，多数参与者对猫耳山环境不了解，在此之前，只有社团的个别领队去过”，“虽然先前准备了登山装备，但并未做好夜间行进的大量准备，携带的手电数量有限。同时，食品已基本消耗完”……这是获救驴友遭遇网友铺天盖地质疑的关键。由此，就滋生了一种貌似理直气壮的逻辑：凭什么因为少数人

救驴友怎么是浪费公共资源?

的过错去大量浪费公共资源？作为纳税人之一员，我凭什么要去为他们埋单？请恕我直言，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逻辑。

我不知道警方为此次救援耗费多少财力物力，大抵这笔“成本”也无法“平摊”到39名获救者身上。生命无价，不要说39条生命，纵然只有一人，公共资源的支出救援也是理所应当的。生命高于一切，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而公共救援支付的“警力和资源”存在的意义，就是维护公共安全。假如警方每一次救援都要测算一下成本，衡量一下是否值得，那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灾难。

救驴友浪费公共资源的逻辑，代表着

●/新书浏览

香料之路 海上霸权

北京理工大学二〇一一年二月 傅奇翰主编

回顾欧洲人对以胡椒为代表的香料的追逐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原来地理大发现只不过是欧洲人寻求香料之路的副产品，世界正是在欧洲人对香料的争夺中而得以重塑……

《香料之路——海上霸权》详细讲述了“香料之路”的形成，以及在对香料之路的追逐过程中一个个殖民帝国是如何兴起和衰落的。

●/社科选萃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历史选择。著名改革研究专家迟福林教授《中国：历史转型的“十二五”》一书，从历史分析的视角对“十二五”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独特的研究。据我所知，过去的一年中，迟教授在多种场合阐述了“十二五”改革发展的基本思路、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本书是作者在2010年的讲稿和论文的基础上编写的，反映了作者对“十二五”实现我国历史转型的系统思考，也是作者在提出并倡导《第二次转型》和《第二次改革》的基础上，专门讨论“十二五”改革发展问题的力作，书中的诸多观点给人很大的启发。

“十二五”：历史性转型的关键5年

——评迟福林教授的《中国：历史转型的“十二五”》

宋晓梧

济总量、反贫困等方面都起到了历史性作用。随着我国由私人产品短缺走向公共产品短缺，发展型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国富优先不仅难以释放发展型消费需求，还会延缓经济结构调整，加剧生产过剩的矛盾。从变化了的内外发展环境出发，实现发展方式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历史转变，是我国二次转型与改革的重点所在。作者强调，民富优先的改革是释放社会总需求的现实选择，是扭转收入分配差距的现实途径，是实现公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提出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民富优先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具有独到见解。

“十二五”要破解的现实难题。作者提出：“十二五”需要尽快形成“以消费为主导、城市化为载体、低碳为基本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的新格局。在我看来，这是作者所描绘的“十二五”改革发展路线图。

第一，走向消费大国是“十二五”的历史趋势。“十二五”能不能初步形成走向消费大国的历史趋势，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消费主导侧重于关注人的实际需求，更能够体现以人为本；消费主导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主导强调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经济持续增长建立在可靠的内需基础之上。为此，“十二五”适应消费主导时代的客观趋势，深化以扩大国内消费为总体要求的改革，将为建设消费大国奠定重要的制度基础。

第二，城市化主导是“十二五”的历史突破。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城市化进入“快车道”。城市化是个大战略，就在于以城市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有着巨大的潜力。未来5-10年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依赖于城市化的实际进程。为此，要努力实现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初步形成城市化主导的基本格局。

第三，低碳经济发展是“十二五”的历史要求。对我国而言，低碳经济不仅是挑战，更是一次机遇；不仅是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更

“十二五”：历史性转型的关键5年

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社会问题在“十二五”如不能得到有效缓解，不仅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增加经济领域的危机因素，增大解决问题的难度。“十二五”应把社会体制改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加大改革力度。而“现在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同农民工作问题间接或直接相关”。为此，作者专门就农民工作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十二五”：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的命题。应该说，过去的30年，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为工业化、城市化做出了历史性巨大贡献，但却难以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十二五”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十二五”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我很早就提出过“农民工一词应当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用语”，自然十分赞同“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的命题。但我认为“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将相当艰难，正真能起步就是伟大成就，但愿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之时，我国不再有农民工群体存在。

作者是我的老朋友，开卷细读，仿佛就在对面侃侃而谈，又言之有据，神采飞扬，又饱含忧国忧民之情。故向关注、关心、支持我国改革事业的朋友推荐《中国：历史转型的“十二五”》。（书评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文艺茶座

索菲亚——西班牙王后的生活智慧

索菲亚——西班牙王后的生活智慧

西班牙索菲亚王后向两位采访者卡门·恩里克斯、梅迪娜·埃米利奥·奥利瓦·奥尔多雷斯介绍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回答了二人一百多个问题。这本《索菲亚——西班牙王后的生活智慧》(徐蕾、施建中译，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王后谈到了她的重要想法、她关心的话题、她的忧虑，以及她的个人爱好。

●/文艺茶座

在这个时代，已经很少有人如此痴情爱情那般火热地痴情于诗歌了。爱情的纯粹和火焰的颜色，随着时间额外之物的玷污，而变得越发褪色，这已经构成了诗人们不敢去面对最彻底的拷问，或者是最真诚的省察。

李少君面对诗歌在当代境遇提倡的诗歌草根性，可以浓缩为三个传统加持诗人的道德，即中国诗歌传统的道德审美、西方传统的个体觉醒、中国第三代诗歌对个体存在场域关注的传统以及诗人面对他者、自然众生的情怀。事实上，第三代诗歌最大的遗产应该来自诗人的中国文化自尊意识以及对当下性的关注，这方面纠正了朦胧诗的宏大叙事沉湎与放大的个体情感体验和理性追求模式。而2010年的“海上对话”则是李少君在草根性诗学基础上外延出来的“女性+网络”诗人全体创作现象实例描述中，此刻用了一个具体而感性的描述性词语——“新红颜写作”。不管对中国现代诗歌命名的命名描述在发生如何的变化，李少君都在强调着诗人面临现代生活所遭遇的个体如何保存自身完整性，进而获得自足自在自在的丰盈状态。在此，启蒙主义所带来的个体紧张性，被诗人们在创作无意中忽视、搁置

新红颜写作：当代诗歌写作的一种新景象

——《新红颜写作诗歌档案》阅读手记

陈亚冰

了——“生活在孤山营就要善于与植物交流/否则你就孤独死”(李承恩《孤山营，植物》，在此女诗人回归到人类劳作现场与植物进行交流，参悟而获得自足，“把阴影从心里全部赶走”。

正如面对着自然离原上草而对诗歌生发出了“草根性”，李少君面对女诗人在受教育水平提高了、生存压力较男性轻、网络发表及交流的自由规避了来自男性审美及已存在审美(泛指旧红颜，及伪颜色写作)等当下存在而创作的诗歌现象，提出了“新红颜写作”的命名灵感。应该清楚的是：“草根性”诗学及外延诗“新红颜写作”都已经在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一种新的景象，它应该作为第四种诗歌传统，那就是：诗歌创作必须回归到个体以及主体发生的现场(关于“现场”，李少君曾多次在文章中描述为“当下性”)以及诗歌必须呈现诗人的身份品质等。

在《新红颜写作诗歌档案》前言，李少君对“新红颜写作”诞生现象的描述，容易让我们想起西方个体意识觉醒的历史。西方“浪漫主义”的兴起，是现代社会的肇端，而个体觉醒早已潜伏在基督教信徒的文章内。直至15世纪生产力提高带来的丰富物质，自然科学(理性主义)的发展及国力扩张过程带来的人类自信，人们逐渐挣脱宗教意识而回归个体。面对个体意识觉醒所在带的归属问题，也就是人类归属——古典时代的人类归宿以归于历史、国家、宗教为止——则成为现实最紧迫的必须解决的事实。考察“存

●/特色图书

《憨包子与小丫头》

艾米·黄颖 著 万卷出版公司出版

本书是著有《山楂树之恋》、《十年忽悠》、《致命的温柔》的艾米最新推出的亲子书。小时候的艾米是调皮鬼，长大后她拥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在这本充满爱的书里，艾米记录了她的童年故事，等到黄米宝宝呱呱坠地后，初为人母的她用妙笔又记录了育儿的快乐……

《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三辑)·新红颜写作诗歌档案》李少君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